

中亚与上合组织

集体身份构建与上海合作组织 凝聚力建设

杨进

【内容提要】新时期上海合作组织凝聚力问题备受关注，尤其扩员后组织工作效率、议程制定以及执行力面临诸多挑战。由于成员国的复杂多样，中国，俄罗斯，中亚成员国，新扩员的印度、巴基斯坦，以及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上海合作组织每一个相关国家都有各自的自我国际身份定位，这种身份追求的异同决定它们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呈现多样化，各成员国对待组织的立场、态度和选择也各有不同，直接影响组织的议事日程和行动效率。因而，组织框架内集体身份的构建对于加强组织建设，形成强大凝聚力至关重要，国家利益的理性需求成为上海合作组织集体身份构建的重要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组织框架内的法制建设和共同价值观营造。上海合作组织应着重规范建设，以清晰的共同行动规范、认同的共同价值重构上海合作组织文化，使“上海精神”内化为成员国紧密合作的意识自觉，以此强化上海合作组织内部治理和国际行动能力。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 集体身份 规范 凝聚力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9)05-0116-0015

【作者简介】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2018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中国青岛峰会无疑将成为该组织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数量增至8个,扩员后首次峰会的议题更加丰富,最终达成的成果也比以往更显突出。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前后,一个备受学界关注的话题是:扩员后的上海合作组织在议事日程、组织效率、执行力等方面是否变得问题更多,上海合作组织的战略定位是否更加模糊不清,上海合作组织的凝聚力是否更加不足。本文以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从身份认同视角对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进程中,尤其是扩员后有关组织凝聚力问题进行述评,解析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组织平台的国际行为与自身国际身份互动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上海合作组织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在社会学研究中,身份指的是行为体是谁或者是什么的内容。身份认同则是对主体自身的一种认知和描述,包括很多内容,如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地区认同等。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关于国际组织的成长研究往往以物质或观念为基础构建不同理论和解释途径。物质主义出发的研究缺乏对身份认同等观念性因素的解析,仅仅从权力、利益等层面分析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组织或一体化进程的动力因素,忽视了国家行为体自身在国家进化进程中会依据对自身和他者的身份认知,自主选择加入或者拒绝国际组织或某一一体化进程。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利益和身份相一致,“每一种身份都有与之相关的需求和客观利益,行为体对这些需求和利益的认识又构建了驱动行为的主观利益”^①。这表明,国家追求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国家在做出行动时选择何种态度和立场,与自我国际身份认知有关,理性国家不会做出超出自身国际身份的选择。

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很好地反映了成员国对自身国际身份的认知以及对组织发展的需求。从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于在边境地区裁军谈判,到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关于边境地区军事互信构建,最终形成90年代的“上海五国”机制,共同的安全利益需求,尤其是冷战后新独立国家追求国际舞台平等成员身份,对于“上海五国”这一上海

^① 贺刚:《自传体叙述与身份进化的动力: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比较研究》,外交学院博士论文2015年,第2页。

合作组织雏形顺利迈向成熟发挥了积极作用。除中国外，后苏联空间其他几个国家，在国家利益追求和国际身份认知中，都是“崭新”的国际成员，需要与周边国家重新构建国家关系，获取新的国家身份。它们与中国的共识在于，通过“上海五国”共同行动，在冷战后国际格局中，彻底抛弃中苏对抗时期形成的沉重历史包袱，重新构筑与中国的和平友好关系，降低各国安全威胁并促进区域合作，强化新主权国家的多元国际身份，这也是中亚各国积极参与“上海五国”机制的认同动力。

成立上合组织符合成员国区域身份、价值取向及国家发展前景预期。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区域身份是指依托上海合作组织，把本国国际事务的参与空间推向亚太地区并立足欧亚，强化本国的地区国际身份，提高本国国际地位。《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明确把本组织定位为面向欧亚地区的区域性国际组织，这在空间上符合成员国追求的国际身份与地缘定位（但不是唯一定位）。所谓价值取向，是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认可上海合作组织谋求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的基本价值，换言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核心的“上海精神”，是成员国在国际交往中普遍认同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冷战后多极格局形成的历史时期，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上海合作组织之所以吸引成员国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与上海合作组织所遵循的基本价值与信仰符合历史潮流有关。非军事化、不针对第三国、平等协商、淡化国际合作意识形态因素、追求互利互惠的务实效率，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基本特征，充分体现了本组织的核心价值观。所谓国家发展前景预期，对于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而言，它们拥有的共同特征——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意味着它们的国家发展目标都是追求现代政治文明和市场经济前景，追求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历史洪流。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初并没有特意设定本组织吸纳的成员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的要求，但在客观上，无论从最初的创始成员国，还是后来加入的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以及新扩员成员，无一例外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这一身份属性，意味着在本组织框架内，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近，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具有平等性，合作的利益目标具有相向而行的特点，也意味着本组织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追求的国家发展前景预期与成员国的国家身份属性基本一致。

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身份认知异同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与国际体系进行互动的方式是“国家社会化”,即,任何国际组织的成员与国际组织本身都需要按照当时国际体系的规范方式(如制度、机制、观念)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适应不断变动的国际体系,从而在具有整体性的国际体系中找到自身位置;而成员国互动体现为“身份互构”,成员国或者国际组织分别通过持续调整自身国际身份并同时建构与对方的关系来适应体系。就上海合作组织而言,成员国自我身份认知的异同直接影响它们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立场、态度与方式,并促成成员国自身身份构建以适应国际体系的变动。因此,分类讨论成员国身份认知的意义在于借此厘清它们参与上海合作组织行动的基本心理动机。

(一) 俄罗斯

俄罗斯是上海合作组织创立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一直在寻求全球新格局下的自我身份定位与国家利益目标,从参与“上海五国”机制到积极创建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的相关外交努力锁定大国复兴与重建全球影响力目标。其东方政策的重要实现路径则是重修与东方最大邻国中国的关系,增加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其与中国实现互动的重要平台,构建其欧亚大陆新的权力和利益格局。

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为本国国际身份纠缠不已,无论是大西洋主义、斯拉夫主义还是欧亚主义,哲学层面的讨论时常使这几大主义在政策层面此消彼长又互为影响。俄罗斯是谁,俄罗斯去向何方,是俄罗斯政治家和学者费尽思量的问题。叶利钦执政时期在外交政策上曾经一面倒偏向大西洋主义,在没有得到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积极响应后,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在实际操作层面开始占据重要地位,普京时代这一特征尤其明显。为塑造欧亚地区大国身份,普京不仅强化了独联体、集安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这些俄罗斯主导的国际机制,而且也对上海合作组织投入了巨大精力,俄罗斯不仅是上海合作组织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的积极塑造者。

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立场与态度,与自身国际定位及其追求的国际身份一致。俄罗斯认为,冷战后世界处于多极格局演变进程中,俄罗斯有能力而且必然成为世界一极。恢复全球影响力大国,是俄罗斯长期追求的国家目标。俄罗斯

认为,无论是东亚、西亚、南亚和中亚,都存在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参与不同国际机制,选择不同国际合作平台,通过规则制定灵活塑造俄罗斯在这些地区的利益格局,是俄罗斯实现战略目标的现实选择。上海合作组织既包含东方大国中国,也有中亚主要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还先后吸纳了阿富汗、伊朗等西亚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尤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2017年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实现了该组织向南亚地区深度拓展,都为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工具箱增添了新内容。

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战略定位存在矛盾心理,这同样与俄罗斯的身份定位有关。尽管俄罗斯对国家身份的定位存在所谓三大主义,但是在实际国际战略制定上,俄罗斯时常陷入矛盾。从深层次看,俄罗斯更加认同其欧洲身份,获得欧洲认同、回归欧洲俱乐部是俄罗斯精英数百年孜孜不倦的战略追求。但是在欧亚地区,俄罗斯却认为蒙古统治时期的文化浸润又使其具有东方色彩,获得欧亚大国影响力,也是俄罗斯精英层根深蒂固的观念。既然上海合作组织包含中国和四个地处欧亚内陆核心位置的“中亚”国家,那么俄罗斯就必须把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其在欧亚地区发挥影响力的主要平台之一。

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理解,不仅包含了通过与中国在组织框架内合作、安排其全球战略布局中的俄中关系因素,还包含了与中国在欧亚地区竞争的因素。一方面,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整体恶化,欧美持续制裁使其国家战略空间进一步压缩,俄罗斯进入所谓“百年孤独”状态,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加强与中国在多边和双边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有助于拓展俄罗斯这一时期的全球战略空间。另一方面,在俄罗斯看来,中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进入中亚,尽管属于后来者,但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迅猛,俄罗斯未来主导中亚国际事务的最大竞争可能来自中国,因此,俄罗斯必须主动参与,积极塑造上海合作组织,从组织规则、组织文化和行动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相得益彰,互为补充。

俄罗斯的多种身份定位和国家利益观,形成了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复杂心态和立场。即,一方面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主动塑造上海合作组织使之成为俄罗斯主导的地区国际机制的有机部分;另一方面极力避免上海合作组织在本地区形成优势,从而弱化俄罗斯主导的其他机制影响力。这可以解释俄罗斯在对待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自贸区建设和扩员等事项上何以采取复杂多变的立场。

（二）中亚成员国

笼统谈中亚未免失范和缺乏解释力，但是作为后苏联空间国家的中亚各国在地缘、政治形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文化类型等身份因素方面都具有相似性，因而它们对于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追求的国家利益和身份目标具有高度相似性，其态度和立场也有颇多共同之处。

从中亚国家地缘认知看，各国普遍视本国为“中央亚洲”国家。这一概念不仅具有地理属性，即中亚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亚洲中心，而且还具有政治、宗教和文化属性，即纳扎尔巴耶夫所总结的“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地带^①。因而，在中亚国家认知中，中亚是一系列文化和文明综合体之间进行联络的桥梁：1. 同西方；2. 同阿拉伯—伊朗世界；3. 同俄罗斯；4. 同中国^②。基于此，中亚国家对上海合作组织的首要认知是，这一组织囊括了中亚主要国家，并包含周边大国俄罗斯和中国。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亚国家地缘政治和多元文化连接点的自我认知相一致，这是中亚国家认同上海合作组织的地缘和文化心理因素。

从各国追求的国家利益和国际身份看，作为后苏联空间国家，中亚各国普遍处于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巩固主权独立、维护国家安全、构建符合本国历史条件的民主政治体制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各国的共同追求。中亚各国的转型进程，是把参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作为基本途径的，具体到外交层面，则遵循多元平衡外交战略，加入重要国际机制，形成本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体系网络。中亚参与的国际合作网络丰富多元，但是从多边合作视角看，与中国进行合作的主要平台是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间多层次相互协作的有效平台”^③。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国的合作，中亚国家巩固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立国家身份，获得了更多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资源。

在中亚各国多元平衡和务实外交战略框架下，上海合作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与俄罗斯完全不同。中亚各国视上海合作组织为实现其多元平衡和务实外交战略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而不仅仅是补充。需要强调的是，中亚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始终抱有积极立场与态度，这不仅基于合作带来的物质利益，从主权和安全视角看，中亚成员国期待组织内平等合作的成员身份不断强化，在降低俄罗斯戒心

① [哈]努·纳扎尔巴耶夫：《在历史的长河中》，徐葵等译，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② 同上。

③ 《乌兹别克斯坦学者：“上海精神”已成鲜明的当代国际语汇》，载环球网2018年6月11日，http://www.sohu.com/a/235022468_162522

的情形下引入中国合作伙伴,提升各国在大国外交中的地位,并使中国这样的大国成为平衡俄罗斯的重要力量之一。在中亚国家构建独立国家身份的历史进程中,将始终重视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在国际合作中把它置于首要地位,这是各国对上海合作组织认知的出发点。

(三) 新扩员国家

印度和巴基斯坦于2018年6月首次以正式成员国的身份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使得青岛峰会格外引人注目。上海合作组织首次扩员意义重大,是该组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但是,由扩员引起的诸多争议和问题也日渐显现。本文之所以再次提及上海合作组织凝聚力老议题,与扩员后凸显的新问题不无关系。

作为南亚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区域性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无论国家发展道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是国际影响力都存在较大差异,两国国际身份定位和对外政策也完全不同。在印度的自我认知中,视本国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是亚太地区重要国家和新兴市场之一。巴基斯坦则视本国为重要的南亚地区大国,伊斯兰世界重要国家。两国都是不结盟运动的参与者,印度的外交战略更加灵活,几乎同时与世界主要国家建立了良好外交关系,追求全球影响力的努力十分明显。而巴基斯坦更加重视与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国家关系。

由此,印度和巴基斯坦对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立场和态度有微妙差异。印度看重上海合作组织涵盖的地区和国家可能带来欧亚地区重大地缘影响力的前景。印度总理莫迪认为,“只要印中两国相互信任、照顾彼此利益,亚洲和世界就会有更美好的未来”。“俄罗斯和欧洲诸强等都是印度崛起的借助力量,印度也愿意‘东进’寻求与东南亚近邻互利合作。”^①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印度能够同时在区域层面增加与中国和俄罗斯在多边框架内的合作机会。可以认为,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是印度追求全球大国身份、主动参与塑造亚太国际秩序的重大考量。但是,从印度传统外交理念看,作为不结盟运动主要发起者之一,印度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认知应该是其全球战略政策工具之一,印度始终不会把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其参与全球和地区事务的主要途径。

巴基斯坦近年来的外交政策也在进行显著调整,除了强化与伊斯兰世界及中

^① 傅小强:《携手中国实现亚洲复兴,印度很清醒》,载海外网2018年6月11日,<http://nanhai.haiwainet.cn/n/2018/0611/c3542184-31332284.html>

国传统的友好关系,巴基斯坦越来越重视发展与欧美、日本、俄罗斯等其他大国关系。有学者认为,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有平衡印度的考虑,但是必须看到,巴基斯坦在上海合作组织有诸多切身利益。首先,上海合作组织可以成为巴基斯坦协调与中国、俄罗斯两个大国关系的新的多边平台;其次,巴基斯坦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可以拓展其与中亚邻国的合作空间,扩大地区影响力;最后,巴基斯坦需要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区域合作,为本国安全和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巴基斯坦学者苏尔坦·哈利认为,“在上合组织的框架下,所有这些不那么发达的成员国都会因更大的平台而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①。

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国际身份的细微认知差异,是它们认知和对待上海合作组织的心理基础。整体而言,印度的大国地位使其在国际格局中拥有更多腾挪空间,上海合作组织是印度参与塑造欧亚地区国际秩序的新途径,但不是唯一手段,这决定了印度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政策灵活性。印度甚至可以随时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身份,遂行特定外交目标,2017年中印之间发生的洞朗事件是印度该政策的直接表达。

(四) 中国

中国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最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进入新时代,同时指出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未来一个时期国家发展的总目标。中国在外交上承诺始终走和平发展道路,永不称霸,这是中国国际身份定位。中国对待上海合作组织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与中国国家利益和身份定位相一致。在中国看来,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区域性国际组织,目标和宗旨十分明确,那就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推动地区和平与繁荣,提升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改善成员国民生福祉,使之成为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并不是因为该组织以中国城市命名,也不是因为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设在中国。按照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运行规则,成员国身份一律平等,在工作机制上实行协商一致原则,中国与其他成员国享有完全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中国之所以高度重视上海合作组织,在

^① 《“上海精神”指引上合发展 也是上合组织初心所在》,载《国际在线》2018年6月10日,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02852863989264437&wfr=spider&for=pc>

于该组织的确是最能体现中国外交理念的区域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提出的一系列重大议题、倡议和项目,基本反映了中国和平发展、平等协商、互利互惠,维护共同安全,推动共同繁荣的外交政策。

中国重视上海合作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与中国一贯主张的建设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立场相吻合。中国所指的国际新秩序,并非挑战和改变现存国际秩序,而是指当今全球治理需要参与式、分享式和包容式发展,在国际事务上应该更加强调公平、合作以及大国责任,避免在国际规则制定上搞一言堂,广泛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等等。上海合作组织尽管只是区域性国际组织,但是自成立以来,始终不渝贯彻着上述理念,是中国向本地区乃至全球宣示外交理念,争取国家利益,塑造大国形象的最佳平台。因而,长远看,中国将始终把上海合作组织建设置于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

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集体身份构建的关键因素

集体身份是社会学概念,指某一个群体共同拥有的身份。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借助社会学对国家行为进行分析时,这一概念被用于解释行为体参与国际行为的心理学认知。具体而言,如果某一国际组织成员拥有共同价值观,认同和接受共同制定的国际规范,那么这些成员认同的身份,就是集体身份,它有助于组织在更高层次上合作。在分析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自身国际身份认知之后,有必要对成员国构建集体身份的路径进行讨论,以期对新时期上海合作组织凝聚力议题提出有益构想。

(一) 以“上海精神”为同心圆的共同价值观及其建设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所处地缘位置、民族构成、文化心理和历史记忆各不相同。从文明角度看,按照亨廷顿划分,各国分属斯拉夫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儒家文明等不同类型。在这样一个多样文明地带构建区域国际组织,必然出现核心价值观的一致性问题。国际组织的发展与壮大有赖于其承载的核心价值观呈现的共同追求。上海合作组织从成立起,尽管没有提炼并明确共同价值观概念,但是在组织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始终践行着组织的基本价值观。具体而言,“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基本价值观。

冷战后国际格局进行着深刻调整,多极化与全球化成为潮流,同时两种趋势又为世界秩序带来一系列新的严峻挑战。多极化未必意味着世界更安定,而全球金融危机则促使国际经济格局重新洗牌。边缘国家铤而走险,拥核自重,引发地区危机;一些国家内战不止,族群深陷冲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毒品走私和跨国犯罪四处蔓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大国博弈工具,逆全球化暗潮涌动。这些因素,在上海合作组织涵盖区域或周边均不同程度存在,严重威胁地区稳定与发展。如果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应对这些威胁与挑战时具有相近或相同利益目标,那么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基本价值观就应该能够趋于一致。合作增互信,合作求互利,合作遵循身份平等和协商一致原则,在合作中求同存异,追求最大公约数,谋取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淡化国家意识形态,对彼此文明采取相互尊重和互学互鉴态度,归纳起来就是“上海精神”。这是上海合作组织基本价值观所在,也是上海合作组织能够得到大小成员国一致认同的根本。今后,无论上海合作组织如何发展,这些基本价值必须长期坚持,使之成为组织成长的生命线。

上海合作组织的价值观构建也存在随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涵的必要。当提到“上海精神”时,实际上应该把“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基本表述作为内核,以其为核心,构建上海合作组织精神与文化的“同心圆”。在2018年青岛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倡议构建上海合作组织新的“五观”,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些新理念,不仅是对上海合作组织核心价值观的有力补充,而且是丰富和扩大“上海精神”同心圆内容的有益做法。

(二) 上海合作组织的共同规范及其建设

规范是指行为体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规范被看成是协调理性行为体之间行为的手段,既包含规定作用,还具有构成作用。规范或者构成认同,或者规定行为,或者两者兼有。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即使组织规范趋于虚转,但是规范一旦被成员认同和接纳,那么这些规范即便不能兑现为直接利益,仍然可以强化成员共同接受的价值与身份。规范建设是国际组织强化身份认同和提高凝聚力的有效途径。上海合作组织的共同规范,主要指成员国共同遵循的制度和机制。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8年的历程,也是组织规范建设的历程。从上海合作组

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的批准开始,18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批准的条约、协议、声明、备忘录等各种文件成百上千。这些文件构成了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之间的责任和权利,规定了它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对地区和国际事务采取何种立场与态度等等。这些规范性文件,是指导成员国在组织框架内在不同领域合作进行的基本遵循。

随着上海合作组织职能定位不断拓展,在组织框架内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合作的内容不断丰富,在合作机制方面也日益显现灵活性和多样性。近年来,成员国外长会议、国防部长会议、安全会议秘书会议、最高法院院长会议、文化部长会议、旅游部长会议、妇女论坛、政党论坛、媒体峰会、文化艺术高峰论坛等会议与会晤机制,扩大了成员国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和不同部门合作与交流的渠道,是对那些制度性规范的机制性补充。

上海合作组织比之一些成熟的国际组织,在规范建设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例如组织范围内协商一致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对组织的协调力和行动力具有阻碍作用。尽管从国际政治民主价值观和照顾弱小成员国利益等方面看这一原则具有正义性,但是在一些复杂的、涉及各方重大利益的合作事项上,可能出现某成员国基于自私目的滥用协商一致原则阻碍协议达成或者执行,从而损害本组织共同利益的风险。再比如扩员制度,尽管上海合作组织在文件上对扩员条件做出了原则规定,但是由于本组织没有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区域、成员国关系、申请和批准等重要准入条件做出更明确和更细化规定,更有扩员价值的国家可能受阻于本组织进入门槛,而对本组织发展可能带来“麻烦”的国家又被过早提上扩员议程。因此,规范建设对于上海合作组织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存在巨大空间。

(三) 上海合作组织合作中的“务虚”与“务实”辨析

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起,凝聚力话题就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内容。有学者认为每年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议题不集中,制定的文件执行力不足,成员国利益迥异,观点立场有差别,向心力弱,务虚多于务实等等,简言之,凝聚力不足。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学界对组织发展“脱实向虚”的担忧日增。这种担忧有其道理,特别是印巴矛盾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消极影响显著。本文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不应担心“脱实向虚”,任何国际组织在解决合作问题时,都存在“虚”“实”两面。在有的领域务实多,在另一些领域“务虚”也能发挥特殊效果。如“共同声明”,往往只表明价值观、态度和立场。

上海合作组织务实与务虚的关系符合辩证法原则。上海合作组织定位为区域国际组织，并不意味着组织功能单一。事实上，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定位从政治合作、经济合作、安全合作到人文合作，涉及国际合作组织的几乎所有领域。如前文所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所处地缘环境不同，国家发展模式、发展阶段和经济体量有异，文明类型和参与的国际机制网络也各不相同，对国家利益的追求目标以及自身国际身份定位也必然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基本诉求也大相径庭，很难要求成员国中的小国和大国承担相同责任，也很难要求大国在定位上不把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其主导的其他国际机制的补充性平台。因而，在相关合作领域，上海合作组织制定的文件、达成的协议难以执行，只要不损害成员国利益，就属于可以接受程度。也就是说，在某些领域的务虚，并不意味着上海合作组织凝聚力存在问题。

相反，上海合作组织应该避免在某些领域的“务实”。比如，应该长期坚持避免上海合作组织的军事政治一体化。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目标在于谋求地区稳定与繁荣，并非高度一体化，更不是建成军事政治一体化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也不应该像欧盟那样追求超国家体身份，更应避免提出一些高度政治化和超出实际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口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遵循“上海精神”基本价值观，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塑造本国在国际体系中平等成员的国际身份，确保主权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认同上海合作组织，使上海合作组织成为本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务实”的根本体现。

上海合作组织以“上海精神”为核心，在发展观、合作观、安全观、利益观、文明观等最能体现成员价值观认同的方面已经取得高度一致性，这是上海合作组织吸引成员国积极参与区域合作的认同要素。在规范建设领域尽管存在诸多缺陷，但是作为年轻的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探索中完善规范，使规范不仅成为成员国在组织框架内进行合作的共同遵循，而且能够为成员国带来其追求的国家利益，包括自我国际身份塑造。

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后，本组织面临的新问题在于新老成员关系磨合以及新成员对本组织的集体身份认同与规范遵循。由于印巴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尤其是围绕主权领土问题的争端和边界冲突，印巴关系走向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在合作层面对上海合作组织议程设置以及协商一致原则都提出了新挑战。安全合作范围是否扩大到协调双边关系，中亚议程是否还是上海合作组织始终关

心的话题，多边经贸制度安排如何推进到新成员，等等，相关规范依然有待进一步完善。

结论

上海合作组织是诞生于 21 世纪的全新区域性国际组织，其凝聚力来源于成员国对组织遵循的基本价值观“上海精神”的一致认同，其活力来源于上海合作组织为成员国持续提供的规范和一系列公共产品。上海合作组织与成员国都属于国际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互动不仅塑造了上海合作组织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与位置，同时也塑造着成员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与定位。

上海合作组织价值观构建始终事关本组织长远发展大计，共同价值观是国情差异巨大的成员国在心理层面形成集体身份认同的基本要素。因而，只有以“上海精神”为核心，构筑上海合作组织价值观“同心圆”，不断充实“上海精神”内涵，形成成员国广泛认可的组织文化和精神，才能凝聚成员国始终把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本国和本地区迎接新挑战、解决新问题的最佳平台。

规范应该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建设的重要方向，除了新机制建设，理顺现有制度和规则，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法制建设，构筑明确、清晰和可执行的上海合作组织行动规范，形成特色鲜明的上海合作组织文化，使成员国无论大小强弱，均能自主按照既定规范承担相应责任与义务，这是上海合作组织提高议事效率和强化凝聚力的根本途径。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有务实的一面，也应该存在务虚的一面。所谓务实的一面应该集中在成员国追求国家利益的具体领域，如打击“三股势力”保证共同安全的联合行动，经贸领域的便利化制度安排；等等。务虚的一面应该属于象征性合作领域，高度复杂化的成员国利益在特定机制下难以消化，虚化合作同样可以达到成员国利益保障的目标，如成员国对国际身份的追求。上海合作组织甚至应该避免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形成高度一体化的合作关系，敏感领域“虚实结合”的合作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上海合作组织凝聚力。

（责任编辑 李淑华）

Построение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цементирующей силы ШОС

Ян Цзинь

【Аннотация】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цементирующая сила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ШОС) привлекает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в частности, после расширения у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озникли проблемы в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работы, определении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и ее выполнении. В ШОС представлено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членов,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члены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овые члены организации – Индия и Пакистан, а также страны-наблюдатели и партнеры по диалогу, имеет свою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 различия и сходства в их стремлении к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определяют их мотивацию участия в коллект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Позиции, взгляды и выбор государств-члено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также различны, что напрямую влияет на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реализации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оэтому построение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рамках ШОС имеет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важ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укрепле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цементирующей силы. Рациональные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на основе которых формируютс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стали важным фактором в построении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ШОС, но, что более важно, это построение прав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и общих ценностей. ШОС должна сосредоточиться н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нормативной базы,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и культуры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 четкими общими нормами действий и общепризнанными общими ценностями, чтобы «шанхайский дух» вошел в сознание тес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членами, тем самым укрепляя внутренне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ШОС 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йствия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ШОС; 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нормы; цементирующая сила

Collective Identity Building and Cohesion Building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Yang Jin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cohesion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fter the enlargement of the SCO, many challenges have been faced i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s work efficiency agenda in particular. SCO is complex and varied because its composition. It includes China, Russia,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e new members of India and Pakistan, observer states and dialogue partners. Each relevant country has its own international identity position,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of identity resulted in motive diversification of each member state's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action and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 the organization's position. This choice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iciency of the organization's agenda and action.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within the SCO framework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strengthen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form a strong cohesive force. The rational needs of national interest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within the SCO. But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and the creation of common value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In order to strengthen its capacity for intern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action, the SCO should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orms of common action, restructure its culture with shared values, internalize the Shanghai spirit into a sense of close cooperation among its member states.

Keyword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ollective identity; norm; cohesion